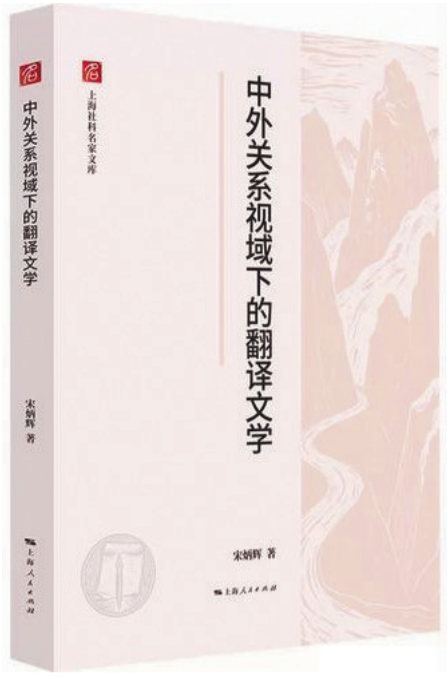


宋炳辉《中外关系视域下的翻译文学》

绕道而行的风景

□赵稀方



宋炳辉曾描述自己的研究历程，“从研究中国文学的兴趣出发，绕道中外文学关系，不经意间看见了翻译研究，看见了翻译研究的山洞溪径”。他将自己的翻译研究称为“绕道而行的风景”，在我看来，正是这个“绕道而行”成就了他。

书中专门论及了“汉语翻译文学的多学科视域”问题，这是只有来自外学科的学者才能观察到的问题。在作者看来，翻译研究学科并不仅仅属于外文系，它是一个特殊学科，连接着外语学科和中文学科及其由之而来的众多学科。书中专门提到，为适应时代和社会的发展，教育部已对外语一级学科作了重新划分，将其分为语言学、外国文学、翻译学、比较文学、跨文化研究五大领域。其中翻译学赫然在列，显示出翻译学的地位已被外界公认。不但如此，宋炳辉认为，翻译学的特点还在于它其实与其他四大领域都有密切联系。宋炳辉所论述的多学科性，实际上重构了翻译研究的内容。

炳辉本科、硕士和博士都就读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去上海外国语大学就职。由于这种经历，他受到了贾植芳、陈思和和谢天振等教授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知识结构。贾植芳主要作为七月派作家而受到中国现代文学界的瞩目，却并没有受到翻译文学史的注意。在这本书中，宋炳辉专门从翻译角度阐述，贾植芳不但有丰富的翻译成果，而且有独特的翻译思想，他很早就提出翻译与创作具有同等的意义和价值的观点。陈思和教授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大家，其独特之处在于他的视域非常开阔，他较早就采用了比较文学和翻译学的视角，也较早就关注了港台华文学。谢天振教授更是国内翻译文化研究的先行者，被同行称为“中国的埃文-佐哈尔”。这种得天独厚的环境，让宋炳辉能够博采众家，汇聚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中外文学关系和翻译文学等学科为一体。宋炳辉一开始并不是从事翻译文学的，而是从比较文学和中国文学关系的角度研究中国文学，这样才关注到翻译研究，从此，翻译研究成为他的利器。

因为这种研究背景，宋炳辉能够从中国现代文化文学背景上看到翻译文学的重要性。翻译是中外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有的，但是在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学翻译中却出现了一个突出的现象，即“翻译文学数量之多，持续时间之长，更重要的是影响之大”。他用贸易中的“入超”这个词来形容这个现象，即“译入”严重大于“译出”。这就意味着，“译入”文化现象对于中国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构成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书中从定量和定性两个角度来说明这一点。从量的方面说，1919至1949年间，全国共出版新文学书籍13500种，其中翻译达3894种，年均122种，占比达到29%。这个数量是惊人的，我们不能对将近三分之一的文学产品置之不理。从定性方面说，新文学的构成受文学翻译的影响极大。书中分别从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的角度，论述了翻译在新文学文体建构中的重要作用。

事实上，赵家璧等人编撰的第一个十年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就是将翻译列于其中的，而后来陈子展、王哲甫、朱自清等学者也都重视文学翻译。宋炳辉希望在此基础上扩展有关翻译研究的新的论述空间。他提出，中国应该走出外文系以语言对等为中心的翻译格局，增加翻译的文化研究的维度。早在上世纪70年代，西方就出现了后者所谓文化学派的翻译研究，也称操纵学派，是70年代以来以比利时、荷兰等国家学者提出的文化路径为主的翻译研究方法，其代表人物有霍尔姆斯、埃文-佐哈尔、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等人。这种翻译研究的思路，恰恰不是以语言的对应而是以翻译的差异为前提，研究自源语言向目的语的转换过程。用宋炳辉的话来说，“从翻译观念角度来看，西方翻译的文化学派已经从理论上对此做出了回答，他们认为，翻译无论作为一种跨文化实践过程还是这一实践过程的产品，都是目的语系统而非源语系统的事实”。在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操纵学派早已与文化研究结合起来，成为国际显学，中国翻译研究的确已经落后了很多年。

宋炳辉的这种翻译论述不但是对中国传统翻译的一种革新，更是一种挽救。在当下的AI时代，翻译已经遭遇重大挑战，很多高校开始撤销外语及翻译专业，这对外语和翻译专业也是一个重大挑战。宋炳辉从新的翻译思想所提出的回应，我认为是非常有力的。众所周知，AI目前在翻译领域大显身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替代人工翻译，这是翻译面临的挑战所在。不过，宋炳辉认为翻译分为两类：一是对应性强的应用语言，这种翻译是机器大体能够替代的；另一种是对应性弱的文学语言，AI翻译是有效性不足的，机器无法代替人类，“那些主要基于高对应性关系的解决方案，在面面对语际弱对应性文本，面对作为翻译语料-文本的文学、哲学文本，以及体现不同文化系统的思想、文化和信仰内涵的文本时，其有效性显然有所不足，真正有效的文学、思想和哲学文本的机器翻译的可能性至今未曾显现，而人工翻译仍显示着足够的必要性和创造性空间”。最足以说明问题的是诗歌、汉诗被译为外国文字后，再译回汉语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机器翻译在诗歌上是做不到的。如果我们的翻译研究还停留在语言对应翻译的阶段上，那它确有被机器翻译取代的危险。

在翻译文学研究的区域上，宋炳辉的研究也显示出非外语系学者的鲜明特征。他选择的非西方文学的翻译，东欧、南欧和北欧等，显示出后殖民主义的非“西方中心主义”的眼光。更独特的，是宋炳辉有关世界语翻译的研究。在翻译研究界，世界语很少受人关注，它既不是西方语，也不是非西方语，而是一种中立的人造语言，但在宋炳辉看来，世界语天生内含反抗语言强权和同情弱小民族的含义。因为西方大的语言较多为人所知，而小的民族国家语言只能是小语种，中国以世界语为中介的外国文学翻译多是东欧等弱小国家的文学。鲁迅是赞成世界语的，中国现代以世界语为中介的翻译者也是“为人生”一派的人。如此看来，宋炳辉的翻译研究就不是单纯的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思想史脉络的研究。书前周宁的关于后殖民主义的总序，看起来与书中内容无关，其实形成了一种思想上的回应。

宋炳辉的翻译文学研究的另一个特征，是对于作家翻译的研究，这应该是他的本行。本书的第二章，专门分节研究了茅盾、徐志摩、穆旦、叶君健、周立波、贾植芳、王蒙、韩少功的翻译。这是一个跨度很大的名单，在学科上，“中国现当代文学”其实包括“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两个完全不同的学科，但宋炳辉经由翻译跨越了这两个不同的学科，也体现了由陈思和教授开创的打通现当代文学的复旦治学传统，这是很难得的。（作者系南昌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译介之旅

将激情和热爱赋予文学翻译

□郭兰芳

期待了许久，终于来到松阳的译者之家。坐在窗前，世界突然安静了下来。我就这样坐着，静静地看眼前屋顶的瓦片、斑驳脱落的土墙、层层叠叠的山墙，不远处那棵在“译者之家”公众号里屡屡出现的450岁的马尾松，还有远处绵延不绝的青翠的山峦。接我的叶师傅说，这个村子有四五百年历史。那么，过往在这里生活的都是什么人？他们在这里经历过怎样的爱恨情仇？再看一眼那棵默默守望了450年的马尾松，突然有了“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的感叹。

因为对驻地生活期待已久，我一直关注“译者之家”公众号，里面发的往期译者的文章，每一篇我都仔细阅读。翻上几篇，你就会发现，几乎每一位驻地的译者都表达了对译者之家无比的喜爱之情。坦白说，抵达之前，我很急切地想知道这些读着如此真切的情感究竟是出于文学效果的需要，还是各位译者的真情实感。然而，就在我静静坐在窗前的那一刻，换言之，就在我来到西田的约莫一刻钟的时间里，我想我已经找到了答案。而接下来几天的无数个瞬间又进一步确认了我的回答，甚至让我此前的怀疑显得庸俗而可笑。

很快，我就找到了我认定的译者之家最合适的“打开方式”。如果天气晴好，那么不要犹豫，一定要去牛栏咖啡的室外露台。在冬日的暖阳下，伴着咖啡屋的音乐码字，时不时抬头欣赏眼前的群山和炊烟，我愿称之为第一等的幸福。碰上阴雨天，小朱和嘻嘻两位民宿主理人会启用室内的壁炉。小朱帮我把户外的方桌搬进来，嘻嘻很贴心地为我铺上桌布，然后我们围着壁炉各自忙碌。我在翻译，嘻嘻和娜娜在沙发上做手工，壁炉里的柴火噼啪啪地烧着，音乐在欢快地流淌。屋外狂风大作，室内却温暖而宁静。我想我又重新找回了生活的质感。

我们都是“译乡人”

来到西田的第一天，小朱拉我进同期驻地译者的专属群，塞尔维亚译者保阳给我的欢迎词是：“欢迎郭老师，我们的新译乡人！”听到这个称呼又惊又喜，觉得再贴切不过。后来听说这是黄荻老师的“发明”。在译者之家的一大收获是认识了许多“译乡人”，因着这共同的身份，大家相互之间似乎不用过多的客套，可以迅速以朋友的方式相处。在短暂的11天时间里，和不同的译者有过不同的对话，其中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和保阳在牛栏咖啡的壁炉边所进行的一场关于翻译的对话。他跟我聊到了塞尔维亚的中文教育，聊到了他的翻译历程，聊到了他为何放弃企业的工作而成为全职译者。我在他的话语里充分感受到了他对翻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当他说出“中文是我的母语”时，我看到了他眼里的光。那个画面，如此动人。

自AI诞生以来，我想所有的“译乡人”都不得不去面对的一个问题是：翻译将何去何从？然而，就在我看到保阳眼里那道光的那一刻，我似乎找到了答案——这种只属于人的激情和热爱，这种“活人感”或许是AI永远都不可能具备的，而这样的激情和热爱将赋予文字一种独特的灵魂和魅力。

到目前为止，我只有了一本独立译作——克里斯蒂娃的《黑太阳》。这本书和我之间的奇妙缘分，我曾详细记录在《黑太阳》的译后记里。这里不妨再次回顾：依然清晰地记得，九年前的某个秋日，初到巴黎求学的我在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ALCO)宽敞明亮的图书馆偶遇了巴黎七大数学系的一位教授。当我跟他谈起我的研究课题（精神分析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他十分兴奋地向我推荐了克里斯蒂娃的这本书——《黑太阳》，因为这正好也是一部文学与精神分析跨界的作品，而克里斯蒂娃也恰好是七大的教授。至今依然记得那个午后，阳光斜斜地照进图书馆，空气里有着一种无法言说的平静与安宁。在图书馆里与那位老师低声畅聊一个多小时，感叹数学系的老师竟对文学了如指掌。我对巴黎最初印象便停留在这个画面之上。

2020年春天，疫情肆虐，烦闷之中的我找到欢，请她帮我留意，如果有心理学方面的书籍译者可以交给我翻译。欢欢很快告诉我，他们社刚买下《黑太



阳》的版权，问我是否有兴趣。一时喜出望外，感慨缘分如此奇妙。随后的三年，教学、科研、带娃，生活颇为忙乱，翻译工作一直在见缝插针地进行。一路诚惶诚恐，因为“克里斯蒂娃”对于我而言是神一般的存在，也因为我与这本书之间有着奇妙缘分，生怕自己水平不够，无法准确理解和传达作者的原意。

十几年过去，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位数学老师在我笔记本上写下的SOLEIL NOIR, JULIA KRISTEVA几个词。他怕我看不懂，全部写成大写字母，字迹看着颇为幼稚。因着这样的奇妙缘分，这本书于我而言不再是一本普普通通的书，而近乎成了某个与我的生命有着某种关联的老朋友。在AI如此风行、翻译的价值不断被质疑的今天，是什么让我们这些“译乡人”依然在坚持？我想或许就是我们对自己要翻译的书籍的珍视、对翻译这项工作的热爱吧。

翻译的传承与使命感

驻地生活期间，每天都会期待的是杰哥的大餐。因为赶上寒假，同期驻留的译者较多，每天晚餐的场面都颇为壮观。大家天南海北地畅聊，从来不用担心冷场。

宁春艳老师临走前的那顿晚餐是我印象最深的。宁老师不仅是翻译家，也是戏剧导演。在闲聊中她回顾了自己如何走上翻译的道路，也跟我们分享了她在



《黑太阳》译者朱莉娅·克里斯蒂娃，郭兰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3月

翻译道路上踩过的“坑”。她的译作基本上都是戏剧作品，而她做翻译很大程度上都是出于现实的需求：她要把这些法国的剧作搬到中国的舞台。她说，法国戏剧有特别的分量，非常值得向中国观众推介，这么多的戏剧作品，她不来做这事，谁做呢？她轻描淡写，似乎只是随口说的一句话却在我内心激起了层层波澜。她并没有使用“使命感”之类高大上的词汇，但我感受到的，正是这样一种力量，以及这种力量所支撑的某种坚持。我专门给她发了消息，感谢她跟我们分享这些令人动容的过往，她的回复简短却意味深长：“跟你们分享这些，你们的未来会更加精彩！”

几乎与此同时，我翻译了《野蛮的部分》里这样的几个情节：作者Marc Weitzmann 视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为自己的偶像，称其为“奥林匹斯众神之一”。这天，他收到罗斯的邮件，这位美国文坛巨匠为他联系好出版商，提议他写一本关于法国犹太人的书。收到邮件，Marc 激动不已，他在书中写道：“你刚才真应该看看自己的表情，你简直是在说他就是宙斯。我刚刚看到了你孩童时的模样。在罗斯的杰作之一《美国牧歌》的开头，小说的叙事者内森·祖克曼很偶然地在一个人体育场遇到了他童年时崇拜的英雄，上面这句话是与他同来的女士说的。我把这封邮件足足读了十来遍才给他回信，当时在我身边的斯蒂芬妮或许会对我说同样的话。”

我想我是幸运的。那些曾经在书上看到的、令我敬仰的名字，因着这样或那样的机缘，出现在我的生命里，与我的生活产生交集。而这样的相遇在不知不觉中给我带来了许许多多影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重新塑造着我的心性。宁老师的分享或许无心，但是，于我而言，她在践行着某种“传承”。是的，传承……而我们的翻译在一定程度上不也是一种传承吗？不仅是代际传承，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传承。

由此，我不由得想起，来到西田的第一天，我看到很多村民门口都挂着“拯救老屋行动”的牌子。和大多数古村落一样，西田村日常只剩下一些老人在这里生活。有天下午，在五心书院和安娜聊天，才知道当地政府保护老宅方面可谓下了极大的功夫。从日常交流大致能够感觉到，表面上看起来书院的游客不多，但是他们的生活状态总体自在而坦然，在他们身上感觉不到这个时代年轻人身上普遍存在的焦虑感。安娜说，这背后离不开政府的助力。其实，“译者之家”不就是“拯救老屋行动”最为直接的一环吗？我们这些“译乡人”的到来不也正是给这些老宅注入新的活力吗？由此，我们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拯救老屋行动”，参与了文化的传承。愿译者之家长青，愿“传承”永不止步！

（“松阳·译者之家”驻留项目由浙江省松阳县委宣传部主办，南京大学当代外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担任学术指导单位）



驻地译者们正在译者之家工作 马柱摄



望松堂的窗景 郭兰芳摄